

帆影留痕：海南《更路簿》与南海丝路文化遗产的国际传播

蒋秀云 (Jiang Xiuyun)¹, 过迅行 (Guo Xunxing)²

摘要：作为南海丝路的关键节点，海南地区的航海技术世代传承，把我国南海诸岛各岛礁名称、准确位置、渔民出海航行针位（航向）、更数（距离）、潮水等知识记录下来，在南海丝路发展、成熟的过程中，产生海南《更路簿》。海南《更路簿》不仅是连接我国东部海域与南海丝路，其所记录的海外更路也是连接日本、琉球、交趾、占城、暹罗、大泥、马六甲、吕宋等海外港口的针路指南，帮助海南岛与东南亚、亚洲及整个世界的物产实现跨区域、跨流通。同时，海南《更路簿》中所记载多个地名，构成完整的“琼人俗名”地名体系。不少地名随着 18 世纪以后外国殖民者与探险家对南海诸岛的测绘，被翻译成多种语言，进入各类航海地图，成为国际命名体系的一部分，对世界地理认知产生深远影响。

关键词：南海丝路；《更路簿》；海南；国际传播

Title: Sail Shadows Leaving Traces: Hainan's *Genglu Book* and the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the South China Sea Silk Road Cultural Heritage

Abstract: As a key juncture of the South China Sea Silk Road, Hainan's navigation technology has been passed dow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recording the names of the islands and reefs in South China Sea, their exact locations, the compass positions (directions), the number of shifts (distances), tides, and other knowledge. In the process of the development and maturity of the South China Sea Silk Road, Hainan's *Geng Lu Bu* was produced. Hainan's *Geng Lu Bu* not only connects eastern waters in China with the South China Sea Silk Road, but also serves as a compass guide for overseas voyages. Its recorded routes link ports across Japan, Ryukyu, Jiaozi, Champa, Siam, Dani, Malacca, and Luzon, helping Hainan Island to facilitate cross-regional exchange of goods with Southeast Asia, Asia, and the entire world. At the same time, the multiple place names recorded in Hainan's *Geng Lu Bu* constitute a complete "Qiong people's common names" place name system. Many place names have been translated into multiple languages and entered various nautical maps as foreign colonists and explorers surveyed and mapped the South China Sea islands since the 18th century, becoming part of the international naming system and having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world's geographical cognition.

Keywords: South China Sea Silk Road; *Genglu Book*; Haina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¹ 蒋秀云 (Jiang Xiuyun)，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南海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电邮：xiuyun0614@163.com。

² 过迅行 (Guo Xunxing) (通讯作者)，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中外文学关系比较。电邮：2573013527@qq.com。

古代东、西方交通贸易有陆、海两途。瓷器、茶叶、香料、丝绸、铁器等大宗商品主要依赖海上贸易。从我国岭南各港口起航,经海南岛,穿过南海诸岛,从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诸港,由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各国,过波斯湾、红海,延伸至欧洲的贸易航线,被称作“南海丝绸之路”,简称南海丝路。至晚到公元前2世纪西汉时,南海丝路已经成熟。由于古代中国航海技术的领先地位,中国渔民是环南海段丝绸之路的主角。海南渔民自古航行于南海诸岛,面对“风大浪高,暗流涌动,沙滩和暗礁众多……难以预测的台风”(阎根齐,2019, p.195)等挑战,创造并积累在南海航行的民间航海技术,最终形成海南《更路簿》,得以传承下来。《更路簿》,又称“南海更路经”“南海水路经”“水路簿”“更流簿”“针路簿”“流水簿”等,是海南渔民在南海诸岛世代航海实践的民间航海针经。它详细记录我国南海各岛礁名称、准确位置、渔民出海航行针位(航向)、更数(距离)及各到达岛礁的特征,包括南海诸岛历史、自然、地理、天文、命名、航海技术等内容,是指导海南渔民生产实践的抄本。它是大航海时代中国南海航海技艺的代表,有助于外国探险家理解亚洲海域的航海路线及地理特征,形成其亚洲航海文化及地理认知的海洋记忆。

海南地理位置特殊,“琼州地居海中……外匝大海……南通占城(今越南南部),西通真腊(今柬埔寨)、交趾(今越南北部)、暹罗(今泰国),东通长沙、万里石塘(均指我国南海诸岛),东北远通广闽浙,近通钦廉高化”(顾可久,1890, p.4b),是南海丝路避风、补给的枢纽。作为我国舟子秘本的特殊形态,《更路簿》所记海外更路丰富而详尽,为中国与东南亚及印度洋沿岸国家商品贸易、文化交流提供技术保障。海南《更路簿》的国际传播,为外国探险家在南海海域进行测绘、命名等提供研究材料,推动世界对南海地理认知,从而促进中外文化交流。

一、南海丝路与海南《更路簿》的产生

在史前时代,海南渔民已经学习探索在南海生活。距今一万年左右的三亚落笔洞遗址坐落于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荔枝沟东北部,是南海早期人类活动的一个重要洞穴遗址。“在洞穴遗存的堆积物中,发现了大量的水生软件动物遗骸,堆积十分密集。”(肖一亭,2015, p.131)到新石器时代,海南东南部沿海出现更多代表人类早期海洋文化的形态。考古学家在陵水、万宁、琼海、文昌等地发现多出遗址。比如,在陵水黎族自治县发现大港村、桥山、移辇、六量岭下、石贡、东方新街、荣村等海湾沙丘或贝丘遗址,里面出土数量巨大的贝壳、大大小小的鱼骨、织制渔网的骨针、绘有各类花纹的陶器(赵优,2021年01月25日,第18版)是人类新石器时代在南海北岸生存活的遗迹。至晚在西汉,我国渔民已经在南海诸岛及印度洋沿岸穿梭贸易,南海丝绸之路已经初具规模。《汉书·地理志》记:“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谿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缗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没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遣黄支之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班固,1964, p.1630) J. V. 密尔(J. V. Mills, 1951, p.5)推测这一记录大致发生在公元前140年至86年。据此,他认为,至少在公元前1世纪,我国岭南地区的船只已经穿越印度洋,打开通往西方的海路,南海丝路对外交流已呈兴盛之况。在这一背景下,海南岛航海家在南海诸岛各港口起航,前往越南、马来半岛、泰国湾、柬埔寨、新加坡、马六甲海峡,乃至印度洋沿线开拓海外航路,逐渐构建出覆盖整个东南亚海域的商业贸易网络。

三国时期,242年7月,将军聂友、校尉陆凯率三万水军攻打海南岛。吴国水师远征南海,在中南半

岛沿海地区均建立政权，大大增加海南岛与东南亚国家交流的机会。吴国官员康泰和朱应曾领命出使南洋，到达扶南国（今柬埔寨境内）及其以南地区，带回大量有关东南亚的信息。“扶南国王于 243 年派使者到吴国，有记载显示曾有异国来华的大型船舶，足可容纳六百人，还有罗马帝国控制的近东地区的商人秦论来到交趾（今越南河内一带），由交趾太守遣送谒见孙权。孙权派官吏陪同秦论返国，但该官吏半途在海上病逝。”（罗荣邦，2021，p.20）这些对外交流给海南航海发展带来直接影响，激起海南渔民对海外国家的兴趣，促进其对外贸易的发展。到元代，海南渔民贸易已经范围超出南海周边诸国，到达印度马八儿、科罗曼德尔沿岸以及波斯湾。

北宋时期，1127 年，横跨河西走廊的党项西夏国崛起，对沿线商人课以重税，陆上丝绸之路受阻，海上丝绸之路繁荣。这时期，中国航海、造船等新技术发明层出不穷，指南针应用于航海，南海丝路进入鼎盛时期。楼钥《送万耕道帅琼管》描述其盛况，“晓行不计几多里，彼岸往往夕阳春。琉球大食更天表，舶交海上俱朝宗。势须至此少休息，乘风径集番禺东，不然舶政不可为。两地虽远休戚同”（楼钥，1935，p.47）。“琼管”为海南别称。北宋熙宁六年（1073），中央在海南设琼管安抚司，是海南最高行政机构，统辖昌化、万安、珠崖 3 个军，隶属于广南西路。在楼钥生活时代（1137-1213），琉球（今冲绳）、大食（古代阿拉伯）等海外商船云集海南岛，作为补给中转。“势须至此少休息”呈现出海南作为各国商船必经之路的枢纽地位，是南海丝路的重要中转站。南宋时，更多外国商船来到海南，对宋元政府管理能力提出新要求。为了防止外国商人逃税，广南路提举市舶司黄良心提议在琼州设市舶司，但有大臣以防止贪腐为由“更不施行”，没有获得朝廷批准。《宋会要辑稿》记载的干道九年（1173）七月十二日诏云：“广南路提举市舶司申，乞于琼州置主管官指挥，更不施行。先是提举黄良心言：欲创置广南路提举市舶司主管官一员，专一觉察市舶之弊，并催赶回舶押解，于琼州置司。臣僚言，昔正元中，岭南以船舶多往安南，欲差判官往安南收市，陆贽以为示贪风于天下，其言遂寝，遣官收市犹不可，况设官以渔利乎？故有是命。”（徐松，2014，p.4219）广南路计划在海南设立市舶司抽解回航船舶，说明停泊海南的回航船只众多，已经到了考虑设置市舶司的程度。南宋淳熙三年（1176），占城请求与海南岛通商。但宋朝廷称“朝廷加惠外国，各已有市舶司管主交易，海南四郡即无通商条令，仰遵守敕条约束。”

（徐松，2014，p.9820）赵汝适《诸蕃志》中记载其盛：“属邑五琼山、澄迈、临高、文昌、乐会，皆有市舶，于船舶之中分三等，上等为舶，中等为包头，下等名蜚舶，至则津务申州，差官打量丈尺，有经册以格纳钱，本州岛官吏兵卒仰此以赡。”（赵汝适，1993，p.38）为了便于管理，南宋政府特设番民所来管理海南的对外贸易。《岭南丛述》卷五十七记载，宋代熙宁（1068-1077）时，番使辛押陀罗授怀化将军乞统察番长司公事，“番人有居琼管者，立番民所。”（鄧淳，1835，p.10a）到元代，至元三十年（1293 年）九月，政府正式在海南设立海南博易提举司，“税依市舶司例”（宋濂，1976，p.374），次年又置覆实司，掌管当地海贸事务。元代政府愈加重视海南海外贸易，继续设立番民所，“番民所在海口浦，即今海田村，元建所建官，立其民之长麻林为世袭总管，今子孙犹存。”（唐胄，2006，p.577）这些机构的设立，有助于政府管理对外贸易的税收与秩序，保障海南对外贸易的繁荣。海南岛在南海丝路的地位已得到元代政府的认可与重视。中国古代航海针路的秘密性与海南渔民、商人对航海信息的需求之间的矛盾性愈为突出。这一矛盾呼唤新的更路经产生。海南《更路簿》应运而生。

地理学著作的涌现为海南《更路簿》的产生提供知识基础。唐代宰相、地理学家贾耽事无巨细地记录南海丝路的航海线路及海上诸国事。宋代朱彧《萍洲可谈》（1119）、周去非《岭外代答》（1178）、赵汝适《诸蕃志》（1225）以及周达观《真腊风土记》（1295）、汪大渊《岛夷志略》（1350）等都涉及东南亚航线信息。宋元时期，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印度洋的地理学信息了如指掌，南海丝路扩展至东印度群岛及南印度诸国。15 世纪时，明代永乐皇帝派船队远航，给大量中国人到海外的机会。回国后，马欢《瀛涯胜览》（1416）、费信《星槎胜览》（1436）在先进印刷术的推动下，流传甚广，激发海南渔民海外

探索的兴趣。

制图技术进步为海南《更路簿》提供技术支持。魏晋裴秀发明的绘图原则使中国制图技术更加精确。唐朝,我国设置职方司,专门绘制外域地图。《唐六典》记载:“员外郎掌天下之地图……其外夷,每有番客到京,委鸿胪讯其人本国,为图以奏焉”(李林甫,1992,p.162)。经数年研究,贾耽绘制《海内华夷图》。宋代印刷术的发展,进一步推动制图学创新。李符在广州绘制《海外诸域图》《交州图》。13至14世纪之交,朱思本绘制《舆地图》所绘制地域已涵盖南海,“涨海之东南,沙漠之西北,诸蕃异域”(朱思本,1566,p.5a)。可惜,这些制图术不适用于航海实际,无法满足船员的航海需求。

中国渔民在宋代以前就已经掌握季风、潮汐和海流的变化规律。为了满足航海实际需求,宋朝至少刊行11份有关潮汐、风向及水流的海图。渔民还根据经验观测天气,并将之编成朗朗上口的口诀歌谣,以便让海员烂熟于心。中国舵工及船长通常亲自特制海图,指引船只通过狭长的水域和海域。北宋宣和六年,徐兢参考航海指南类工具书“海程”,留下《宣和奉使高丽图经》(1124),被认为是海道针经的最原始版本。元代徐泰亨“下海押粮,赴北交卸”(赵世延、揭傒斯,1936,p.103),将其针路记录成册,编成《海运纪原》的册子,后来以《漕运水程》被辑入《大元海运记》,其中有大量使用指南针进行导航的记载,被认为是现存已知最早的海道针经。元代周达观《真腊风土记》(1297)所载由温州到真腊的航行,“自温州开洋,行丁未针,历闽、广海外诸州港口,过七洲洋,经交趾洋,到占城。又自占城顺风可半月,到真蒲,乃其境也。又自真蒲行坤申针,过昆仑洋入港。港凡数十,惟第四港可入,其余悉以沙浅,故不通巨舟。”(周达观,2006,p.15)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部用罗盘干支法标示的针路记录,也是明清时期大量出现海道针经的先驱。自明朝开始,海道针经在我国历史文献中有了较多的记载。郑和七下西洋,聘有番火长。其二十多年航海经历,本应保存丰富的航海资料。可惜,出于种种原因,除了巩珍《西洋番国志》(1434)、费信《星槎胜览》(1436)及马欢《瀛涯胜览》(1451),基本看不到系统并完整的航海文献。明万历年间编纂出版《武备志》(1621),刊刻《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即《郑和航海图》),是郑和七下西洋时的航海示意图,也是一部最早的针路簿,即海道针经,用虚线上下两侧表示针路,完整地记载郑和下西洋时的针路,被视为典型的针路簿。后来,朝廷禁止大规模海外贸易,仅保留极少量朝贡贸易,但民间航海活动却从未停止。中国航海家所积累的丰富航海经验,被辑录成航海指南,许多针路簿成书¹。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郑舜功到日本前,从广州出发,曾广泛征集海道针经,“人有以所录之书应者,谓之曰《针谱》。……后得二书,一曰《渡海方程》,一曰《海道经书》,此两者同出而异名也”(郑舜功,1939,p.1a)。周伟民认为,“海道针经书一般都在水手、舟子船工或艚公们的手里,是手抄流传的秘本,外间不容易见到。但是在海上,他们跟海南渔民多有交往,所以也就流传出来,跟更路簿互相影响”(周伟民、唐玲玲,2015,p.118)。在这一过程中,海南《更路簿》悄然成熟。

通常情况下,由于海道的重大商业价值,每条海道对船家来说,都是生财之道。针经一般都仅在家族内传承,轻易不会外传,有“舟子各洋皆有秘本”的说法。然而海南绝大多数渔民及船长不识字,海南《更路簿》依靠文书抄写,在知情的部分渔民范围内流传。据海南省民族博物馆的赵家彪说,他的父亲赵向仍(1920?—)(逝世后墓碑上用“赵国荣”,日本网站记录为“赵国盈”)曾于19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专门替人抄写流水簿(蒋秀云,2020,p.17);海南省琼海市谭门镇草塘村卢家美自述与符名凤为多位船长抄写《更路簿》。海南《更路簿》在一定渔民范围内经由传抄者流传。

¹ 在福建、广东一带的因用针路导航,多称《针路簿》,而海南渔民用海南方言写成的本子不仅每一本条文都记载有多少更的航程,而且也写上“更路”篇名,如“东海(西沙)更路”“北海(南沙)更路”、中沙更路、下南洋更路等篇,故被专家统一命名为《更路簿》。

二、海南《更路簿》海外航路与南海丝路海外贸易

按照航行目的地划分,海南《更路簿》所记航路大致有三类:“东海更路”“北海更路”及海外更路。其中前两种指从海南岛各港口出发,前往西沙群岛、南沙群岛的航线;海外更路则从海南岛及南海诸岛出发,到日本、琉球、交趾、占城、暹罗、大泥、马六甲、吕宋等海外港口的航线。海南《更路簿》连接我国东部海域与南海丝路的贸易,沟通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网络。明珠、璧琉璃、象牙、奇石异物等海外物产经由海南岛进入中国,东南亚胡椒、中国茶叶、丝绸、瓷器、铁器等经海南岛远销地中海,海南的槟榔、珍珠、玳瑁、广幅布、五色藤、高良姜等特产输向各地,形成海南岛与东南亚、亚洲及整个世界的双向贸易网络。在全球贸易的视野下,各国物产实现跨区域、跨文化流通,展示出全球化交易网络形成的历史图景。

海南《更路簿》的海外更路航线包括海南岛至海外、西沙群岛至海外、南沙群岛至海外、海外各港口互通及海外返回海南岛等五种更路。按照出发地来划分,其海外更路主要包括海南岛及南海诸岛往返海外及海外各港口之间互通两类更路。除海南岛与南海诸岛航线外,海南《更路簿》中提到若干重要海外中转港或中转港群,包括越南惹岛和昆仑岛,马来西亚雕门岛和奥尔岛,印度尼西亚哲马贾岛(刘义杰,2017,p.31),呈现出海南与全球贸易紧密连接网络枢纽,其范围之广、所涉区域多,呈现出海南《更路簿》对南海丝路多样性与复杂性。

以罗湾头往昆仑岛(Pulo Condore)的更路为例。昆仑岛(北纬8°43',东经106°36')又名昆山岛,中国海道经里还称其大昆仑山,位于今越南南部近海(向达,2000,p.251),自古就是南海丝路的重要节点。元代汪大渊在《岛夷志略》有(1349)“昆仑”条目:“古者昆仑山,又名军屯山。山高而方,根盘几百里,截然乎瀛海中,与占城东西竺鼎峙而相望。下有昆仑洋,因是名也,船泛西洋者,必掠之,顺风七昼夜可渡。谚云:‘上有七州,下有昆仑,针迷舵失,人船孰存’。”(汪大渊,1981,p.218)南宋航海家总结出“去怕昆仑,回怕七洲”的航海谚语。至明初郑和下西洋时,费信《星槎胜览》(1436)沿用汪大渊“昆仑山”条目:“昆仑山,其山节然瀛海之中,与占城及东西竺鼎峙相望。山高而方,根盘旷远,海之名曰昆仑洋。凡往西洋商贩,必待顺风,七昼夜可过。俗云:‘上怕七洲,下怕昆仑,针迷舵失,人船莫存’”(费信,1954,pp.8-9)。其后,明代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1520)、张燮《东西洋考》(1617)、张廷玉《明史》都转录费信所录。刘义杰(2016)认为,最迟从南宋始,这条航海谚语已经成为我国航海史上航海家恪守上千年的金科玉律。在《南海天书》所辑海南《更路簿》中,苏德柳、苏承芬、王诗桃、王国昌等抄本、卢家炳藏本、麦兴铄存《注明东、北海更路簿》、李根深执《东海、北海更路簿》、黄家礼祖传本《驶船更流簿》提到昆仑岛的更路有近90条,更路所涉港口包括南沙群岛的西头乙辛(今日积礁)(周伟民、唐玲玲,2015,p.378)、牛路峙,越南的罗湾头(今越南藩朗南的巴达兰[Padaran]角)(谢清高,2002,p.306)、赤坎(今越南东南岸格嘎[Ke Ga]角一带)(谢清高,2002,p.307)、玳瑁(今越南东南岸外平顺[Binh Thuan]岛)(谢清高,2002,p.152),占城港罗湾头外一州,各处具有玳瑁州,如何取义,不得而知(向达,2000,p.240)、鹤顶山(在占城港口西偏南四更,为海舶往来必经之地)(向达,2000,p.275)、真磁(向达,2000,p.246)、禄安、落安头,马来半岛的丁加宜(谢清高,2002,pp.22-23,p.191)(马来半岛一带)(谢清高,2002,p.44)、东竹(今马来半岛东岸外的奥尔[Aur]岛,意为竹岛。有东西双峰(谢清高,2002,p.308),在新加坡海峡,即Pulau Aur,竹岛,在新加坡海峡,为船舶往来所必经,故宋元以来,即见著录(向达,2000,p.234)、吉连州(谢清高,2002,p.28)(今马来西亚吉兰[Kelantan]州一带)(谢清高,2002,p.308)、地盘(今马来半岛东南海域中的雕门[Tioman]岛),菲律宾吕宋(今菲律宾的吕宋岛)(谢清高,2002,p.196),印度尼西亚

亚一带浮罗咧郁（向达，2000，p.243）、斗磁（谢清高，2002，p.146）及等¹。其中，罗湾头到昆仑的航线所载最为详尽。苏德柳抄本《更路簿》记：

罗湾头往昆仑更路。如船在罗湾头离半更开，用坤未平，十七更取昆仑。罗湾头下洋打水有十七八托，正路如昆仑外过。约扣算更鼓，系是看针高底（低），顶头坤未平可见昆仑。或深或浅，打水为定，或有二十余托，又有三四十托，辛酉戌三字。昆仑是浮马，四边不泊舟。覆锅与鹤顶甲庚对，更零远。鹤顶与外任甲庚卯酉对，更余收。昆仑对门有昆仑仔，卯酉对，二更。昆仑甲卯三更见昆仑仔。（周伟民、唐玲玲，2015，p.279）

罗湾头即今越南藩朗南的巴达兰（Padaran）角（谢清高，2002，p.306），周运中认为，“罗湾头应是金兰湾南面的达外克（Da Vaich）角”（周运中，2013，p.184）。这条航线详细记录罗湾头到昆仑的往回针路、罗经方向、路程远近（更数）、打水深浅、是否停泊等信息。其中，罗经方向采用中国天干、地支与八卦合用的罗盘二十四向，每个方向相当于新式罗盘的十五度。以“托”为单位计打水信息，以测量海水深浅，“长如两手分问者为为一托”（向达，2000，p.6），同时参考日月出入、风云变幻、海流潮汐进退等气象记录和歌谣，参考港口自然地物，展示出海南渔民高超的航海技术。较《两种海道针经》有关航线记载，“罗湾头用坤未针取赤坎，看不见州。用坤未八更、坤中七更取昆备北边过。庚酉八更取真崧。罩西十更、辛酉二十三更取玳理州仔内，船尾坐玳瑁州，船头对鹤顶山，又要对船头对庚酉针坐正，方可进港。防南中央淡，生远，记之”（向达，2000，p.63），海南《更路簿》所载航海技术采用单针方式确定航线，航行技术更简单、更快速。

海南在南海丝路上的战略地位，早已被在香港的英国商人发现。他们认为，为了香港贸易的发展，应该派遣英国领事一人前往琼州，“办妥一切有关口岸开放的必要事宜”，纵使“暂时有用炮艇加以保护的必要，也在所不计”（莱特，1963，p.228）。虽继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中英、中法《天津条约》都有增辟琼州为对外通商口岸的规定（王铁崖，1957，p.95，p.105），但由于开放温州，琼州的开放被暂时搁置。1869年10月23日在北京签署的中英《新定条约》第六款规定：“英国议开温州口岸通商，中国照允。中国议将前约所载之琼州口岸作为罢论，英国亦照允。”（王铁崖，1957，p.309）但英国殖民者不甘作罢。1871年9月13日，中日《修好条规》在天津签订，同时签署的《通商章程：海关税则》第一款规定“中国准通商各口”即有琼州口，并注明“隶广东琼州府琼山县”（王铁崖，1957，p.320）。1875年12月31日，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 Hart）发布第38号通令，任命英国人博朗（H. O. Brown）出任琼州海关首任税务司。1876年4月1日，外籍税务司管理的琼州海关终于在海口正式成立。琼州海关的设立，标志着海南岛的对外贸易逐渐脱离广东，成为独立关区，为其服务南海丝路的商贸活动提供更加直接的国际贸易通道。

三、海南《更路簿》与南海诸岛的海外命名

海南《更路簿》是帆船时代海南渔民在南海诸岛航行的“秘本”，是历代航海活动和渔业生产的经验总结。它不仅为海上航行提供精确的导航参考，也为南海诸岛的地名体系奠定基础。1926年，李德光在《承领经营巴注岛及巴兴岛种植渔业计划书》称之“琼人俗名”（刘南威，2018，p.90）。由于该计划书并未被刊出，此称谓长期未被学界所知，后经刘南威阐述、公开，才为我国学界熟悉（刘南威，1994，p.105）。在这个过程中，我国学界对《更路簿》的命名系统出现“渔民地名”“当地渔民习用名称”“土

¹ 不名地区草磁、真仕、珍事未知地区。

地名”“俗名”“固有名称”“乳名”等不同表达（张争胜，2018，p.11）。截至目前的统计，海南渔民在世代渔业生成过程中通过《更路簿》保存南海诸岛地名 140 多个，具有鲜明的海南地域特色。其中，有些地名以罗盘方位命名，如丑未（渚碧礁）、东头乙辛（蓬勃暗沙）；有的用特产命名，如赤瓜线（赤瓜礁）、墨瓜线（南屏礁）；有的用岛礁形状命名，如鸟串（仙娥礁）、双担（信义礁）；有的用某种实物命名，如锅盖峙（安波沙洲）、秤钩峙（景宏岛）；有的以水道命名，如六门沙（六门礁）等。这些地名形象生动、通俗易懂，兼具科学和普遍性特征，是海南渔民长期观察海南诸岛礁形态的总结。即使未经官方核定时，它们也拥有鲜活的生命力，因此被世代相传，沿用保存。

与海南渔民世代耕渔南海不同，西方人对整个亚洲，尤其是南海诸岛，认识历史并不久远。虽然自中世纪西方航海图中已提及中国，但对南海诸岛的系统测绘要到 18 世纪以后荷兰、英国等国的东印度公司。在 14 世纪以前，西方旅行家、传教士和商人用神话把亚洲描绘成一个“非凡人所居住的地方”（本卡尔迪诺，1998）。到 15 世纪中叶，西方人仍不了解亚洲的区域划分，对南海诸岛的轮廓也知之甚少。随着《马可·波罗游记》、波焦·布拉乔利尼《命运变幻史》（*Historia de Varietate Fortunae*）、弗兰切斯科·巴尔杜齐·佩戈洛蒂（Francesco Balducci Pegolotti）的《贸易实践》（*Pratica della Mercatura*）、伊本·拔图塔游记等作品的传播，欧洲出现了阿尔贝亨·德·维尔嘎（1411-1415）、史泰隆（1450）、安德烈阿·瓦尔斯佩哥（1448）、焦瓦尼·莱亚尔多（1453）、1457 年《热那亚世界地图》，弗朗切斯科·罗塞利·恩里科·马尔泰洛（1490）和马蒂诺·贝哈因姆等多种世界地图。但三个不同来源的中国地名“Catayum”（中世纪欧洲人对中国北方地区的称呼，源自“契丹”）、“Sine”（公元 1 世纪中期开始西欧人对中国的称呼）、“Macina”（古代印度、波斯、阿拉伯、东南亚等地人们对中国的称呼）同时出现《热那亚世界地图》来看，欧洲人对于东方的认识仍然非常混乱。他们真正进入东南亚，得从葡萄牙占领马六甲（1510 年）以后。葡萄牙航海家把航行中所收集的地理信息制成海图及世界地图，开启欧洲制图的新阶段。但葡萄牙人一到马六甲，便获知中国人很早就在这里航行贸易，“华人很早便在这一带航行了”，“满刺加（即马六甲）……这个城市所有的物产，如……大黄、象牙、名贵宝石、珍珠、麝香、细瓷及其他各种货物，绝大部分从外面进来，从秦土（*terra dos Chins*）运来”（金国平、吴志良，2007，p.9）。中国他们从中国航海家手中获得南海航行的信息。列格兹比写给墨西哥总督的一封信中提到，自从占领马尼拉后，他们在尽其所能地搜集到有关中国的情报。1571 年 4 月，在赴马尼拉途中，他从菲律宾族人手里赎出五十名船只失事的中国人。这些中国人为他绘制一张广东到宁波的中国海岸草图，“那是他们当着我的面画的，没有用罗盘，也没有高度和度数”（周蓓，2023，p.70）。随着西班牙的崛起，1574 年，拉维萨雷斯总督从在菲岛经商的华人手中，“喜获”明代都御史喻时所绘《古今形胜之图》（1552）。这些为 19 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南海诸岛的测绘打下坚实的基础。

据英国皇家海军档案《中国海航行指南》（*The China Sea Directory*）第二卷载，英属印度孟买海军舰长罗斯和莫恩搭乘“研究者号”（*Investigator*）和“发现号”（*Discovery*）到西沙群岛进行测量。1815 年，莫恩又率英船“研究者号”到中建岛。1865 年，蒂泽德发表调查报告，记录其在东岛、琛航岛及晋卿岛的勘测情况。1867 年，英国海船“来福号”（*Rifleman*）船长里德赴香港时经过中沙群岛，再次测量华光礁。在测量中，他们发现海南渔民广泛地分布在南海诸岛，从事渔业生产。“在大多数岛礁上都可看到海南渔民，他们以采集海参和龟壳作为生计。有些人在岛礁上连续生活几年。海南帆船每年都到岛各礁上为久居的渔民供应大米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换以海参和其他产品，还帮他们把所赚的钱送回家。这些中国帆船在 12 月或 1 月离开海南岛，到西南季风吹动时返航。”（Hitchfield, 1879, p.66）海南渔民在西沙、南沙群岛生产后，到东南亚地区贸易。“中业岛（North Danger Reef）周围有两个沙洲，附近经常有海南渔民采集海参、龟壳等水产。”（Hitchfield, 1879, p.65）“东岛（Lincoln Island）……1 月至 5 月，海南渔船前来捕鱼。”（Hitchfield, 1879, p.79）“在中国海东南部的沙堤与暗礁之间捞捕海参，

晒干海龟和鱼翅。他们3月开始出发——先抵达北边浅滩，放下一到两名船员和几罐淡水；然后前往婆罗洲附近的暗礁捕捞。6月初返航时再接走先前放下的伙伴，并带上其所捕海产。在中国海，我们在岛礁之间遇到不少这些渔船。”（Hitchfield, 1879, pp.383-384）这些航行在南海海域的海南渔民，熟悉南海海域的珊瑚礁构造，了解在沙洲、暗礁、暗沙、暗滩之间，如何避免触礁、造成沉船事件。

为了保障南海海域测量工作的安全，英国海军雇佣海南渔民为其领航。比如，在测量海口湾（Hoi-how Bay），他们发现海南渔民小型渔船的优势，“8英尺的中国船有时会使用该航道。然而，9英尺的英国蒸汽船停在沙滩上时，鱼栅竟到了尽头……在深入了解之前，蒸汽船不得冒险靠近该海岸。”

（Hitchfield, 1879, p.393）他们警告英国蒸汽巨轮不要随意靠近海南岛附近的海域。测量大现礁（Discovery Great Reef）时，他们同样借助海南渔民的航海经验，“海南渔民报告出一个岛礁。但具体位置不详，需小心驾驶。”（Hitchfield, 1879, p.64）法国等航海档案亦类似记载。据1933年法国《殖民地世界》杂志（*Le Monde Colonial Illustré*）所载法国与日本争夺在中国南海的殖民势力，强占南沙岛礁时，发现各岛居民均为海南渔民，他们下多处生活遗迹：

在南威岛（*Île de la Tempête*）……1930年法国炮舰‘马立休士’号（*la Malicieuse*）测量三脚岛时，发现岛上有三位来自海南的中国渔民，如今已增至四位，他们在岛上挖了一口井，种植椰子树、香蕉树、红薯和一些生菜，以捕捞海龟和海参为生……

太平岛（*Itu-Aba Island*）有居住痕迹，一个仍插着香烛的祭坛、一个茶壶、一个炉子和一棵大树下的树叶小屋……

中业岛（*Thi tu*）……有椰子树，五名海南渔民居住，他们以捕鱼和一小块种植着年轻椰子树、香蕉树和木瓜树的土地为生。以非常原始的方式开采表层磷酸盐……（Hitchfield, 1879, p.64）

1933年4月，法国人他们常年在岛上生产生活，定期由帆船运来食物，并运回海龟肉和海参干。这一历史事实对西方人与海南渔民有机会产生语言接触，并对其在南海诸岛命名产生影响，他们把海南《更路簿》所载多个“琼人俗名”转译为英文。据刘南威统计，在西方通用的西沙、南沙群岛地名中，至少有9个地名音译自海南《更路簿》。

今南沙群岛郑和群礁中的太平岛，在英国海军档案中被记为“*Itu-Aba*”（Hitchfield, 1879, p.64）。该词在英文中并无特定意义，发音与《更路簿》中的读音“*Uíduāvē*”（黄山马）接近。在海南方言中，山与沙均有“*duā*”音（Hitchfield, 1879, p.87）。“黄山马”与“黄沙”谐音。据英国海军理查德·斯普拉特利船长记，该岛是“一个低矮的沙岛，顶部覆盖着灌木丛”（Richard Spratly, 1843, p.697）。换句话说，该岛地貌特征有二，一是多沙；二是长期被灌木覆盖。由于缺乏淡水，其落叶覆盖其沙，远望枯叶似黄色，故名“黄沙”。同样在郑和群礁的鸿麻岛，被英国海军名为“*Nam-yit Island*”。这一命名与海南《更路簿》中的南乙峙（海南话读“*Nam'id* 或 *Nammid*”）有关。海南渔民除分布在琼海、文昌外，临高及黎族也是早期躬耕南海的渔民。在临高方言中，“水”读作“*nam4*”；在黎族方言中，“水”读作“*nom3*”或者“*nam3*”（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第五研究室，1985, p.9）。壮侗语族中，很多地名以“水”命名，指该地靠海或临河。比如，洪水读作“*nam4no*”（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第五研究室，1985, p.10）；“水缸”读作“*faɪŋ4luŋ2nam4*”（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第五研究室，1985, p.117）；“水碾”读作“*ma4nam4*”或者“*ŋat7nam4*”（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第五研究室，1985, p.129）。“*yit*”发音接近临高方言中数词“一”（*?it7*）（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第五研究室，1985, p.158）或者“月”（*?it7*）（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第五研究室，1985, pp.154-155）。“*Nam-yit*”是壮侗语中典型的“专名+通名”形式。刘南威认为，“*Nam-*

yit”，源自海南话“南乙”或“南密”，意为“岛呈椭圆形，有砾堤围绕，中为洼地”（刘南威，2005，p.192）。

今西沙群岛中的琛航岛，在英国海军档案中被记为“邓肯岛”（Duncan Island），“这个岛屿由两座低矮的沙岛通过一条沙嘴相连，整体呈现新月形结构”（Hitchfield, 1879, p.64）。在海南渔民看来，岛屿和沙嘴的组合有三个突出部分，类似“三只脚”结构。在海南方言中，“三脚”读作“dāhā”（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方音字典》编写组编，1988，p.3，p.325）。英语中，虽然“h”和“k”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音位，分别承担不同的语音功能。然而，受母语音系干扰，英国海军在把海南方言音译为英语的过程中，依赖于听觉感知，把“hā”误听或归类为更接近“kan”的发音。这种音素混淆可能源于“h”与“k”发音部位的邻近性（“h”是声门音，“k”是软腭音），以及跨语言音素感知中的偏差，最终导致“三脚岛”被转译为“Duncan Island”的拼写形式。

类似的情形还有今南沙群岛道明群礁东南端的杨信沙洲，其英文地名“Lankian Cay”译自“铜金”（海南话读“Danggin”）；今南沙群岛九章群礁西北边缘的景宏岛，其英文地名“Sincowe”译自“秤钩”（海南话读“Singao”）；今中业群礁东缘的铁峙礁，其英文地名“Ihitu Island”译自“铁峙”（海南话读“Hi du”）等。1918年，日本人小仓卯之助在南沙群岛的北子岛见到三位住在窝棚中的海南渔民。由于语言不通，双方以笔谈的方式交流。这三位海南渔民为日本人手绘一幅地图，上面标注出双峙、下峙、铁峙、红草峙、罗孔、鸟仔峙、同章峙（锅盖峙）、第三峙、黄山马峙、南乙峙、第峙（应为秤钩峙）等11个琼人俗名，其中有9个与海南《更路簿》中的地名一致。

海南《更路簿》中所载南海诸岛地名，是海南渔民经年捕鱼，综合其岛礁方位、地貌、大小颜色、水文气候、生物海产等特征后，形成完备的岛屿命名系统。它们不仅代表海南地区的渔民习惯，还得到我国政府承认，逐步被上升为国家层面的正式地名。1935年，民国政府第一次全面审定公布南海诸岛地名时，已注意到海南《更路簿》的命名，其中一些被公布为国家正式地名。陈天赐在《西沙岛成案汇编·西沙群岛岛名对勘表》（1938）中设有“土名”专栏，标有“吧注”（林岛，即永兴岛）、“吧兴”（东岛）（陈天赐，1928，p.1）。这些名称至今依然被广泛使用。这表明，《更路簿》的命名体系具有历史依据与权威。1947年，民国政府内政部方域司公布的南海诸岛位置图等文件，其中大三脚岛（琛航岛）、小三脚岛（广金岛）、四江岛（晋卿岛）、巴岛（永兴岛）等地名被列入“中外旧名”。这表明，《更路簿》的地名在国际与国内地理记载中都具有重要历史地位。1983年，我国政府公布标准地名时把这些地名被称作“当地渔民习用名称”。到2024年，我国政府标准地名采用141个琼人俗名，其中有48处被作为标准地名，81处地名以“当地渔民习用名称”列出，与标准名称对照。通过对《更路簿》命名体系的应用，我国政府有效地将传统地名与现代地理管理体系相结合，为我国南海诸岛的主权维护提供坚实的文化与法律依据。

结语

至晚到汉代，从我国岭南各港口出发，经海南岛与南海诸岛，通往东南亚及世界各港口的南海丝绸之路已经成熟。作为避风及补给的重要港口，海南是南海丝路的必经之地。活跃在南海海域的海南渔民，凭借其世代积累的航海经验和技能，创造出独有的舟子秘本——《更路簿》。海南《更路簿》是海南渔民航海实践的民间针经，是我国大航海世代南海航海技艺的代表，是亚洲航海文化及地理认知的文化记忆。它记录不仅记录海南岛往返南海诸岛的针路航线、风流潮汐、地理特征等，指导海南渔民在南海海域生产、航行，还记录多条通往海外更路。这些海外更路从海南岛及南海诸岛诸港群出发，前往日本、琉球、交趾、占城、暹罗、大泥、马六甲、吕宋等地区，代表海南渔民所开辟的海外贸易路线，是我国南海丝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海南《更路簿》有多种抄本，记录着 140 多个海南渔民的习用地名，朴素而形象，系统完备，是海南渔民在南海诸岛从事渔业生产的文化符号，不少地名被我国政府上升为国家正式地名。18 世纪后，随着西方商业及探险活动的增加，海南《更路簿》逐渐成为外国探险家和殖民者认识南海地理的重要参考，为他们在南海诸岛的测绘与命名提供技术保障。不少《更路簿》中的地名被英国海军转译为英语，成为南海诸岛国际命名体系的一部分，对世界地理认知产生深远影响。

海南《更路簿》以其独特的航海知识体系和文化价值，见证了南海丝路的繁荣与发展，推动了古代中国与世界的贸易与文化交流。它不仅是中国航海史的重要遗产，更是全球海洋文化的宝贵财富。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帆船时代我国南海诸岛中外海图调查与研究”（项目编号：21XZS028）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References

- 班固（1964）：《汉书》（第 6 册）。中华书局。
- [Ban Gu (1964). *Book of Han* (Vol. 6). Zhonghua Book Company.]
- 本卡尔迪诺（1998）：“15-17 世纪欧洲地图学对中国的介绍”，《文化杂志》（春季刊）：7-24。
- [Bencaldino (1998). “The Introduction of China in European Cartography in 15th–17th Centuries”. *Culture Magazine* (Spring issue): 7-24.]
- 陈天赐（1928）：《西沙岛东沙岛成案汇编》。商务印书馆。
- [Chen Tianci (1928). *Compilation of Cases on the Xisha Islands and Dongsha Islands*. The Commercial Press.]
- 鄧淳（1835）：《岭南丛述》（卷 57）。色香俱古室藏板。
- [Deng Chun (1835). *Miscellaneous Records of Lingnan* (Vol. 57). Se Xiang Ju Gu Shi Collection.]
- 费信，冯承钧（校注）（1954）：《星槎胜览校注》。中华书局股份有限公司。
- [Fei Xin (1954). *Survey of the Star Raft, Collated and Annotated* (Ed. Feng Chengjun.) Zhonghua Book Company Limited.]
- 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第五研究室（1985）：《壮侗语族语言词汇集》。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 [Fifth Research Office, Institute of Ethnic Languages,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1985). *Zhuang-Dong Language Vocabulary Collection*.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Press.]
- 顾可久（1890）：《琼管山海图说》。如不及斋。
- [Gu Kejiu (1890). *Illustrated Treatise on the Mountains and Seas of Qiong Prefecture*. Rubujizhai.]
- 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方音字典》编写组（1988）：《海南音字典（普通对照）》。广东人民出版社。
- [Hainan Dialect Dictionary Editorial Team in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1988). *Hainan pronunciation dictionary (Mandarin comparison)*. Guangdo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Hitchfield, J. J. P., Anonymous (1879). *The China Sea Directory, Vol. II, Directions for the Navigation of the China Sea between Singapore and Hong Kong*. Hydrographic Office, Admiralty.
- 蒋秀云，等（2020）：“‘更路簿’的英译现状及其翻译策略”，《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学报》（03）：17-22。
- [Jiang Xiuyun, et al (2020). “The Current State of English Translation of *Genglu book* and Its Translation Strategies”. *Journal of Hainan Tropical Ocean University* (03): 17-22.]
- 金国平、吴志良（2007）：《早期澳门史论》。广东人民出版社。
- [Jin Guoping, Wu Zhiliang (2007). *Early Macao History*. Guangdo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李林甫，等：（1992）：《唐六典》。中华书局。
- [Li Linfu, et al (1992). *Six Statutes of the Tang Dynasty*. Zhonghua Book Company.]
- 刘南威（1994）：“中国古代对南海诸岛的命名”，《地理科学》（02）：101-108。
- [Liu Nanwei (1994). “Ancient Chinese naming of the South China Sea Islands”.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02): 101-108.]

- 刘南威（2018）：“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领土主权属于中国的土地名依据”。刘南威，张争胜：《更路簿与海南渔民地名论稿》。海洋出版社。
- [Liu Nanwei (2018). "Evidence of Chinese Sovereignty over the Xisha and Nansha Islands Based on Toponymy". in Liu Nanwei, Zhang Zhengsheng. *Genglu book and Studies on Hainan Fishermen's Toponymy*. Ocean Press.]
- 刘南威（2005）：“现行南海诸岛地名中的渔民习用地名”，《热带地理》（02）：189-194。
- [Liu Nanwei (2005). "Fishermen's Customary Names in the Current Toponymy of the South China Sea Islands". *Tropical Geography* (02):189-194.]
- 刘义杰，Xie Hongyue（2017）：“《更路簿》中的海外更路试析”，《中国海洋法学评论》（01）：73-96。
- [Liu Yijie, Xie Hongyue (2017). "Analysis of Overseas Routes in *Genglu Book*". *China Oceans Law Review* (01): 73-96.]
- 刘义杰（2016）：“‘去怕七洲，回怕昆仑’解”，《南海学刊》（01）：28-37。
- [Liu, Y (2016). "Deciphering the Saying 'Fear the Seven Isles When Departing, Fear Kunlun When Returning'". *Nanhai Academic Journal* (01): 28-37.]
- 罗荣邦（2021）：《被遗忘的海上中国史》。海南出版社。
- [Luo Rongbang (2021). *The Forgotten History of Maritime China*. Hainan Publishing House.]
- 楼钥（1935）：《玫瑰集一》。王云五：《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
- [Lou Yue (1935). *Rose collection*, Vol. 1. Ed. Wang Yunwu. *The First Compilation of Series of Books*. The Commercial Press.]
- Mills, J. V. (1951). "Notes on Early Chinese Voyage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 3-25.
- 宋濂，王祎（1976）：《元史》。中华书局。
- [Song Lian, Wang Hui (1976). *History of Yuan*. Zhonghua Book Company.]
- Spratt, R. (1843). "Nautical Notices: Ladd Reef and Sprattly Island, China Sea. April 1st, 1843. Cyrus, Whaler, China Sea". In *Nautical Magazine and Naval Chronicle for 1843*. Simpkin, Marshall, and Co.
- 唐胄（2006）：《正德琼台志》。海南出版社。
- [Tang Zhou (2006). *Zhengde-era Gazetteer of Qiongzhou*. Hainan Publishing House.]
- Viville, J. (1933). "Les îlots des mers de Chine". *Le Monde Colonial Illustré* (10): 142.
- 汪大渊（1981）：《岛夷志略校释》，苏继庾校释。中华书局。
- [Wang Dayuan (1981). *A Brief Account of Island Barbarians*. Collation Su Jiq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 王铁崖（1957）：《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Wang Tieya (1957). *Compilation of Sino-foreign Treaties*, Vol. 1.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 莱特（1963）：《中国关税沿革史》，姚会翼译。商务印书局。
- [Wright, S. (1963). *China's Customs Evolution*. Trans. Yao Huiyi. Commercial Press.]
- 向达（2000）：《两种海道针经》。中华书局。
- [Xiang Da (2000). *An Edition of Two Rutters*. Zhonghua Book Company.]
- 肖一亨（2015）：“南海北岸的先秦聚落”，《文化杂志》（03）：131-146。
- [Xiao Yiting (2015). "Pre-Qin Settlements on the Northern Coast of the South China Sea". *Revista de Cultura* (03): 131-146.]
- 谢清高（2002）：《海录校释》，杨炳南笔录、安京校注。商务印书馆。
- [Xie Qinggao (2002). *Collated and Annotated Maritime Records*. Yang Bingnan. Collated An 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徐松（2014）：《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上海古籍出版社。
- [Xv Song (2014). *Draft Compendium of Song Documents (Official posts, Vol. 44)*.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 阎根齐（2019）：“论海南渔民的航海技术与中国对南海的历史性权利”，《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02）：195-224。
- [Yan Genqi (2019). "On Hainan Fishermen's Navigation Technology and China's Historic Right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Jilin University Journal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02): 195-224.]
- 张争胜（2018）：“中国人民对南海诸岛命名的主要称谓”。载刘南威，张争胜（编著）：《更路簿与海南渔民地名论稿》。海洋出版社。
- [Zhang Zhengsheng (2018). "Main Designations for the Naming of the Island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by the Chinese People". in Liu Nanwei, Zhang Zhengsheng. *Genglu book and studies on Hainan fishermen's toponymy*. Ocean Press.]

赵汝适（1993）：《诸蕃志》（卷下）。载《山川风情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

[Zhao Rushi (1993). *Records of Foreign Peoples (Vol. 2). In Landscape and Customs Series*.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赵世延，揭傒斯（1936）：《大元仓库海运记·大元海运记》。文殿阁书庄。

[Zhao Shiyan, Jie Xisi (1936). *Records of Yuan Dynasty Maritime Transport*. Wendiange Shuzhuang.]

赵优（2021年1月25日）：“考古遗址揭秘岛民史前生活：海南远古史话”，《海南日报》：第18版。

[Zhao You (2021, January 25). “Archaeological Sites Reveal Prehistoric Island Life: Hainan’s Ancient History”. *Hainan Daily*: A18.]

郑舜功（1939）：《日本一鉴·桴海图经》（卷一）。民国二十八年旧抄本。

[Zheng Shungong (1939). *Japan Mirror: Sea-crossing Charts (Vol. 1)*. Republic of China manuscript copy]

周蓓（2023）：“16世纪中国地图的欧洲传播”，《国际汉学》（02）：67-74。

[Zhou Bei (2023). “The European Dissemination of 16th-century Chinese Maps”. *International Sinology* (02): 67-74.]

周达观（2006）：《真腊风土记》。中华书局。

[Zhou Daguan (2006). *Customs of Cambodia*. Zhonghua Book Company.]

周伟民，唐玲玲（2015）：《南海天书：海南渔民“更路簿”文化诠释》。昆仑出版社。

[Zhou Weimin, Tang Lingling (2015). *The South China Sea Manuscript: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Hainan Fishermen’s ‘Genglu Book’*. Kunlun Press.]

周运中（2013）：《郑和下西洋新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Zhou Yunzhong (2013). *A New Study of Zheng He’s Voyages*.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朱思本（1566）：《广舆图》，罗洪先（增补）。韩君恩，杜思（刊本）。

[Zhu Siben (1566). *Enlarged Terrestrial Atlas*. Supplied Luo Hongxian. Block-printed Edition Han Junen, Du Si.]